



## 面臨法西斯威脅的歐洲出路何在？

### ——法國哲學家蔚五海 (Patrick Viveret) 訪談之二

于碩

**于碩：**通常歷史昭示給我們的是，經濟危機的加劇會強化國家民族主義和民間排外傾向。歐洲各國選舉似乎證明了人們的擔憂，反歐洲和反全球化的保守政治似乎在上升。

**蔚五海：**歐洲地區的仇外心理的確在上升。歐洲自己的歷史曾有過先例，20世紀30代出現過對中產階級致命的摧毀。假如今天再次出現這種情形，人們可能會退縮，對歐洲60年的和平建設和基本原則加以懷疑。所以說，歐洲存亡的威脅來自歐洲內部。上世紀20年代，希特勒的政黨只有百分之10至15的選票，但當經濟危機造成德國龐大的失業人口時，法西斯黨便獲得了31%的選票，合法地取得了政權。假如今天危機持續加重，我們就不能排除那些小的超沙文主義政黨上臺的可能性。因此，歐洲面臨威脅。

我們有必要重構這個致命的鏈條，它能使整個社會崩潰並支撐專制邏輯勃起。

這個鏈條的演變經歷了四大步驟：

第一步：經濟和金融放鬆管制，會加大不平等，進而削減中產階級的額外受益的來源（主要指他們的小資產：房地產、投資和各種儲蓄金），只剩下了工作收入。受到的影響有：工資停滯，就業不穩，失業和收入下降（包括變相的免費公共和社會服務，這是歷來中產階層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步：中產階級破裂，這一過程使其中下層（特別是由農民變成工人再升為中產階級的部分）強烈感到下降的不公平，成為憤怒的社會來源。理性地分析，這種憤怒應該對超富豪和經濟體制問責，因為他們才是造成倒退的真正根源。但在情感層面上，如威廉·雷馳 (W. Reich) 在《法西斯主義的精神病理學》一書中所論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為了避免下滑，中產階級就要在社會圖譜上維持比自己差或低的階級的“區別” (distinction, 布迪厄)。因此，他們對任何涉及其下降原因的說教都特別敏感，例如認為窮人是威脅他們下降的原因。昨天歐洲血統的義大利人或東歐人，今天的北非血統的阿拉伯移民都成為最理想的替罪羊。

第三步：這塊土地再一次成為“失範的牲口” (“la bete immonde”，布萊希特) 的沃土，極端獨裁和排外的風潮獲得重要的社會基礎。如果民主黨對此危險無動於衷，卻熱衷於其內部無法停止的紛爭，那麼，一段時間後這些極右傾向的領導人就可能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的決定性因素並獲得國家權力。

第四步：由於這種勢力從恐懼和仇恨中汲取營養，因此他們在獲得權力之後，只會通過製造戰爭邏輯和獨裁形式自我延續

**于碩：**這是一幅十分堪憂的圖景。我不相信歐洲和法國會向法西斯折回，至少我拒絕！



**蔚五海:** 那我们就來问一下“世界需要什么樣的法国，什麼樣的欧洲？”能直接启发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們的巴西朋友，世界社会论坛的发起人。在巴西国内抵制民族主义邏輯的討論中，他们自己也經常受其困惑，於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世界需要什么樣的巴西？當欧洲，特别是法国被仇外情緒和焦慮所籠罩，希臘出現了排外傾向的今天，我们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向我們自己提問。

有一點是明确的，像你的反應一樣，我们的回答應是：世界不需要一个自我折合的歐洲。歐洲曾將其他文化拒之門外，曾被血腥世界的戰爭惡魔所掌控，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个極權體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同样，世界絕不需要一个傲慢的、喚起人們反面記憶的新貝當主義的法国。相反，世界需要一個开放而光明的法國，她能賦予自由運動以最充分的意義，抵抗對人权的侵犯，在增長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面前要求更多的平等<sup>i</sup>，在身份折合和不寬容面前尋求博愛。世界也需要一个有能力積極面對自身弱化的歐洲，由原來的一個支配型強權轉變成一種創造型的力量，面對我們时代的生态和社会挑战，為和平、民主和生命力做出貢獻。

**于碩:** 我相信善能夠戰勝邪惡，這是一種信念，也是一種願望。面對令人髮指的邪惡和無動於衷的冷漠，我們經常需要鼓勵自己堅持。這次歐債危機中浮現出的負面的人性令人糾結，甚至懷疑惡是否是不可戰勝的？幸虧一年前阿拉伯之春帶給人類歷史一種新的經驗，令人鼓舞。

**蔚五海:** 羅曼•羅蘭曾界定過“善良意志的人們”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他們是積極的社會行動者，個人或團體，他們有著共同的信念，堅信《人權宣言》不是一張廢紙，一份新聞稿或新殖民主義的特洛伊木馬。這些人屬於各不相同的政治或精神團體，年齡不同，民族不同，社群及文化來源不同，職業各異。他們不相信和平只是冠冕堂皇的口號，自由只是市場經濟的專利，精神只是原教旨主義的迷幻藥，創業只是強者對社會的剝奪。

正是這些越來越全球化的善的力量，通過他們主動的或消極的抵抗，抑制著今天向野蠻倒退的邏輯，並使人們理解了我們的世界“為什麼不能更壞”<sup>ii</sup>。但破壞力的邏輯今非昔比，避免最壞情形的發生和依賴原生創造性的聯盟已經不夠用。如果像塞厚 (C. Serreau) 的電影所顯示的，面對整體混亂產生的局部解決方案是行動的支點，那麼我們現在就必須讓想像力走得更遠，以便尋找替代策略，打破現有的致命的發展邏輯。

**于碩:** 你还記得 1996 年我们在巴塞羅那组织的协力尽责世界联盟的第一屆大会嗎？从那之後，我觉得有一个我喜歡稱之為的“公民宪章運動”的长足扩展。你與戈巴契夫和里昂市長科龍共同主持的人類對話論壇開風氣之先，啟發了我們之後創立的以對話為主旨的中歐社會論壇。6 月 17 號，我們在巴西裡約+20 雙峰會上將啟動第一屆歐洲-中國-南美三方對話，我期待著它成為人類對話史詩的一个华彩篇章。



**蔚五海：**我們的朋友人文主義思想家愛德加（莫蘭）也去參加你們的三方對話吧，令人欣慰。公民世界一直有長足進展。一些十多年前被視為烏托邦的因素，今天正在變成現實並成為世界治理的關鍵。事實上，我們處於兩種力量的對抗，一種是戰爭的、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即軍事的邏輯；另一種是和平的、民主的和公正的邏輯。許久以來，歐洲聚焦自身問題，沈湎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強大歐洲的懷舊之中。這個輝煌的歐洲今天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歐洲在地緣政治的支配和對抗中不再掌控支配力量。但是，假如歐洲能真正擁有人類相約而行的視野，假如歐洲能認識到重大的人類困境是人類內在野蠻性的問題，就可能超越主權國家地緣政治的局限。

**于碩：**或許這個世界真的糟糕到了極點，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了。

**蔚五海：**你剛剛提到去年的阿拉伯之春。值得堅信的和平、自由和人類良知的高尚品質正在激勵著各種正義的力量。而且正是由於這些力量的存在，才使目前的世界沒有陷入戰爭。這個世界的確很糟，從許多方面衡量，都可以與 20 世紀 30 年代相比，甚至比那時更糟糕。但今天，質疑世界的不公正和專制統治的鬥爭選擇不同的道路，似乎不想再使用以暴還暴的武器。這就是從阿拉伯春天開始的另類全球化運動，憤怒的西班牙人，令人驚訝的華爾街和平佔領，甚至在戰爭和殖民邏輯支配下的內塔尼亞胡政府也有了好消息，以色列運動在特拉維夫小城彙聚了 40 萬人。

我們看到，即使在鎮壓最血腥的敘利亞，手無寸鐵的民眾仍前仆後繼地赤手抵抗坦克。還有 20 多年前那個天安門廣場隻身擋坦克的青年，無疑可以作為主動選擇非暴力的新運動的象徵。事實上，我們正處在革命運動時期，假如我們分析一下變革的激進程度，就會明白這是一場革命。革命者們吸取了以往的教訓，尤其是建立在強權邏輯上的暴力革命的無效。

當代人首次開始提“我”的時候，是在奧斯威辛最卑微的道德自毀和廣島的身體消滅之時。今天我們可以開始積極地提到“我”：我，人類大家庭成員，充分瞭解我的脆弱和我的矛盾；同時我也知道我擁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力，它能將引誘轉換成愛，將信息轉換成覺悟，我們選擇的是生命之路，而非破壞之路。

歐洲金融危機的意義在於讓我們懂得了，金融資本主義和商品化不再能分散我們的精力，因為它們走到了生態的和金融不可持續的極限。於是可能的路徑有兩個，或者是倒退到混亂的邏輯，或者是前進到人性的更高素質。我們看到第二條路徑的可能。人類有可能立足於此，將這個人性價值重建視為生活的力量源泉，將對他者的承認視為機遇而非威脅，讓這種超越意識成為我們大地之行的特權，與我們人性之旅的同路人共同分享。

因此，我們人類大家庭的成員不僅僅可以說“我們人民”——這個詞常常被混同於“我們國家”，也可以開始一起站起來大膽地說：“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公民”真正開始了二十一世紀的冒險！

**于碩：**在危機中的歐洲，這是否只是你這類人文主義者的理想主義或誇張的樂觀主義？



**蔚五海：**在目前抑郁和危机的时刻，我要為歐洲辯護的是，她在無意之中（這是個大問題），已經實驗性地、痛苦地和笨拙地走上了这条人文探險之途。我的這一判斷的依據來自對一份被遺忘了的報告的重讀，該報告是約翰•肯尼迪於1963年8月要求提供的，他被暗殺三年後，1966年再次遞交給他的繼任者。肯尼迪帶著強烈的願望要建立與蘇聯之間的持久和平，他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建立在持久和平的基礎上的全球制度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由多學科研究小組給予的答案，令人驚愕但具有預見性：在我們現有的知識框架中，全球制度建立在以戰爭為目的基礎上，它不只是在軍事領域，而且在所有領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中都太有結構力，應當被放棄。

由 J. K. 加尔布雷斯點評的這份報告以《不樂意的和平？》<sup>iii</sup>為題出版，值得我們今天重讀，因為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當和平的邏輯持續存在的時候，一個在結構上有權決定和平或戰爭，決定他人的生命或死亡的權力需要通過製造敵人來自我維持。我們已經看到恐怖主義的運用，我們正在看到內部敵人的製造，如在法國總統選舉中利用移民問題製造社會敵視。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倒退邏輯面對尋求生存空間的新生力量，企圖竭力保持舊式的權力關係。正如殖民暴力最惡劣的形式發生在其末日來臨之際（我們會想到阿爾及利亞），同樣，人們可以假設，美國所謂的“戰爭系統”目前已經動搖，而在歐洲這一系統的衰敗更是顯而易見。建立在個人或族群的生死權利之上的一種權力今天在歐洲生長，它的三個支柱是：廢除死刑，結束義務征兵，放棄作為社會的組織結構元素的戰爭。

不過，問題在於，作為人類殘酷爭鬥歷史的第一個真正的轉向，在歐洲出現的這三個根本性的變化是不自覺的，不是有意識的積極的方向性選擇，以替代致命的三位一體：戰爭、兵役和死刑。歐洲的確放棄了戰爭，但卻沒有一個促進和平及世界政治的藍圖，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針對一切戰爭來源進行不懈的鬥爭，包括屈辱和苦難的混合爆發，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以及文明的衝突。歐洲廢除了死刑，但其司法系統仍然建立在懲罰邏輯優先的基礎之上，而非預防或改正。歐洲幾乎在所有的地方都結束了兵役，但卻沒有提供跨代際的公民服務，它可以成為政治、社會和公共貢獻的依託，建立針對一生而不僅僅適用於商品化的勞動交換機制。簡而言之，歐洲處於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正在失去昔日的支配力，又尚未受益於創造性的活力。歐洲目前的乏力，碎片化，以至於她的抑鬱症多來自於此。

為了應對可能導致自我毀滅的挑戰，歐洲人需要致力於提高其良知和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難題，就是你長期研究的主題，“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é），即多樣性社會怎樣共建一個人類共同體。這完全是人類良知提升的問題。我們在端點上會發現，人類最大的問題在於相互之間愛得不夠，人類這個物種並不真正相愛。

這種情況也可能發生深刻變化，假如眾多的力量結合起來，以促進建設一個真正的為世界和平服務的歐洲政治，它將建立在公民權利、社會正義、保護我們的生態系統和協作必要性的基礎之上。從歐洲最重要的成員之一的法國來看，她可以擺脫自身的衰落，只要發揮公民的力量，站在人權聯盟的高度，反對仇外心理，敢于全面擔當那三個光芒普照的詞的動力，重新賦予它們以強大的力量：自由，平等，博愛！

歐洲甚至有條件為其他地區做出貢獻。她擁有移民歷史，這是一種運氣，而非威脅。這使歐洲獲得了跨文化對話的經驗，她可以從自身內部開始實現愛德加說的聯結（reliance）同樣，歐洲的老齡化問題，如果我們在量化經濟和地緣政治角度思考問題，



老龄化就是一个負擔；但当我们把老人的記憶、经验和智慧作为财富，那老龄化就变成了运气。

如此一来，有能力拥有“长者”而非只是“老者”就成为我们的一种機遇。让我们来重新检视大量的现象，在經濟占有和政治控制的支配范式看来它们是弱勢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范式——人类建构的范式，它追求觉悟品质、关系品质和生活品质，即世界社会论坛稱之為的“高品質社會目標”。在这个新范式之下，那些弱勢反过来会变成機遇。我们可以借用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曾說的一句話：“危機的产生，在于舊世界迟迟不肯消失，新世界迟迟不能誕生，在这明暗交替之時會出現魔鬼。”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转向舊世界，我們会被无力感和恐懼所挟持，并且被越来越高漲的魔鬼的出現所强化；但如果我们转向創造萌動的新世界，它正在誕生，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希望的源泉正汇成川流。

(2012年6月香港)

---

<sup>i</sup> 參見 Pierre Rosanvallon 被廣泛閱讀的著作《平等者的社會》(La société des égaux)，該書充分展示了在該領域中的社會和民主的倒退。

<sup>ii</sup> Patrick Viveret, 《為什麼不能更壞?》(Pourquoi ça ne va pas plus mal?), Fayard 2005.

<sup>iii</sup> John K. Galbraith, 《不樂意的和平?》(La paix indésirable?); 另參考 Elisabeth Miechelbieck, 《為存在而作為》(Agir pour être)。